

“行得端，走得稳”

■丁晓平

为将之道

讲真话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讲真话。开国大将黄克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或在转折关头义无反顾、捍卫真理，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坦陈建言，即使受到批判、降职甚至面临险些杀头的危险，也依然坚守理想信念，心怀坦荡，始终对党忠诚。

1927年11月，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湖南永兴，秘密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与湘南特委永兴特别支部按上关系。在随后召开的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上，受“左”倾盲动错误政策影响，多数人主张立即举行暴动。黄克诚十分冷静，提意见说：“暴动的事，我当然赞成，但现在还缺乏群众基础，机会不成熟。”有人严厉指责他：“你是胆小鬼，就你黄克诚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1928年1月，暴动组织起来后，湘南特委贯彻“左”倾盲动政策，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搞“大烧大杀”的“焦土政策”，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黄克诚又站出来反对，说：“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结果，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的职务。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为反对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黄克诚与不少人发生过激烈争论。1930年夏，临时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中旬，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作战方针。黄克诚说：

“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这是拿鸡蛋跟石头碰。”有人站出来批判他是“右倾逃跑主义”。由于他一再坚持反对攻打中心城市观点，被认为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红三军团撤销了他纵队政委的任命，继续留任支队政治委员。

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获悉后劝他说：“提了没用的意见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黄克诚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还不让我说，杀了我也不干！”彭德怀感叹：“我看你比我还像彭德怀啊！”黄克诚扶了扶自己的近视眼镜，笑着说：“总指挥，若是为了革命真理，我这脾气怕是改不了。”

他的脾气的确是改不了。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黄克诚因反对“肃反”扩大化、保护基层干部而遭到怀疑，被撤销了第3师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刚恢复师政治委员职务的黄克诚，又多次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批评，由此被军团政治部开会批评，后调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一个星期后又降职为教导营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回答得十分干脆：“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有党史军史学者，对黄克诚一生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批判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大概有10次。然而，后来的历史都证明，黄克诚这10次提出的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1943年，黄克诚所在的新四军第3师第7旅在开展整风运动时，他向上级打报告，明确表示反对整风中的过激做法，不赞成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有好心人劝他：“你这样会有麻烦的。”他坦然地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

有关系，要是这么多同志背上了麻烦，那就可真是麻烦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第3师的干部们面前夸赞黄克诚：“你们的师长眼睛虽然近视，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出黄克诚的刚直人生。他敢于坚持原则，更敢于斗争。而做到这些，需要有勇气、有底气。他的勇气来自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了真理，底气来自他的忠诚担当和清正廉洁。就如同他在日记里给自己写下的那句朴实的座右铭：“行得端，走得稳，夜里好睡觉。”

黄克诚结婚比较晚。新婚之夜，黄克诚一脸严肃地跟妻子唐棣华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于是，他与新娘“约法三章”：“第一，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1949年秋，中央任命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这年冬天，他的哥哥黄时玠来长沙看他。阔别20多年，一贫如洗的哥哥没有向弟弟提什么特殊要求，只是想弟弟给他买一件皮袄御寒。黄克诚一口答应。那时候，皮袄在湖南属紧俏商品，购买的指标极少。不过，凭他的权力，搞一个皮袄的指标不是问题。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给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写了一封信，自己掏钱请其帮忙在张家口买了一件，因为在北方买皮袄方便些，也便宜一些。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副总理，负责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委和总参，工作千头万绪，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各军区、各兵种初建时期的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的岗位上打开局面。这就涉及人力、物力、财力在各部门的分配，都需要黄克诚出面协调、解决。

每次会议上，几乎都有争论，黄克诚每每苦心劝导：“我们要顾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不行，平均主义分配也是不行的……”有个别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与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发生不愉快。对此，黄克诚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我们不要怕骂，当面骂就同他们讲道理，背后骂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算任劳任怨，挨骂、受气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这一年，他已76岁，腰板依旧笔直挺拔。他第一次走进中纪委办公大楼时，袖口别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慎言、慎行、慎权”6个字。秘书看了，笑着问道：“首长还怕忘？”黄克诚摇摇头：“怕自己老了，心软了。”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他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一生刚直不阿为人们所敬重。对于黄克诚，陈云同志曾用8个字评价：军人风范，党性坚毅。还有诗这样称赞他：“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奋斗仗精诚，最佩正气雄。”在他的追悼会上，党中央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称他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岁月荣光

■程文胜

狂雪飞石，呼啸而至
枪刺和号角沉寂
呼吸瞬间冰封
一腔热血却本能喷涌
生死时刻
竭力践行最后的承诺

身躯，掩埋于雪地
手臂，遒劲如树桩
以刺破苍穹的气势
杀出重围
党员证书包裹一枚银元
紧握掌心，高高举起
如一座信仰的路标
岿然矗立

草地怀念拓荒的脚印
雪山不忘奋飞的雄鹰
海拔五千米的巍巍党岭
深情铭刻战士的赤诚
每一次艰难跨越的牺牲
都在增高信仰的海拔
凝聚永远不变的军魂

★

令那种克己奉公的精神，实在不忍心拿去换现洋；可又一想，不去换钱，伙食钱又没有着落，不知怎么办好。无奈，我只得找到军经理处，同叶季壮处长商量。叶处长考虑许久，最后一狠心，把军经理处仅有的100元钱拿了出来。我高兴地找到李谦，把港币退给他，并诚恳地说：“伙食钱已经解决，用不着再换了，钱你留下吧。”李谦把眼一瞪，正要发脾气，又一转念大概想到伙食钱已经解决了，于是“唔”了一声，勉强收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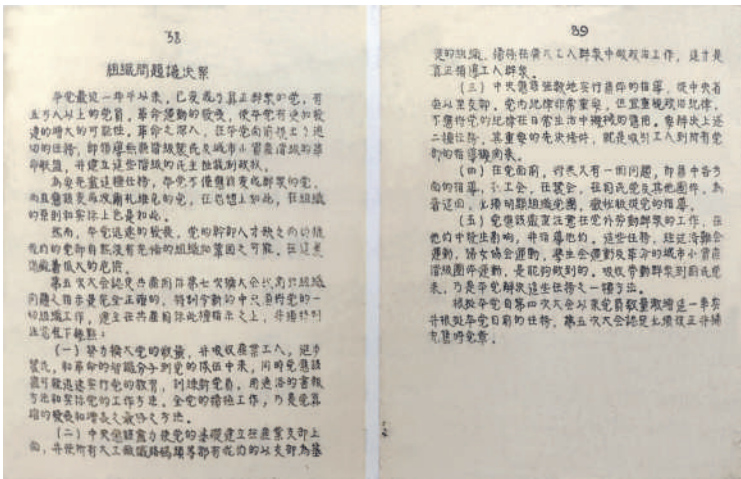
红军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情绪是乐观的，斗志是高昂的。3个月的集中整训，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广大官兵在政治上更加坚定，在军事技术上更加成熟。党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基础，各个党支部经常开会研究工作，部队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起色。

（作者时任红7军第1纵队辎重队队长。文章摘编自《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原标题为《从转战桂黔边到河池整编》，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档案

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



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中央档案馆藏

1927年，中共五大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中共五大召开之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发生半个月，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建设至关重要。中共五大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之一，即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

中共五大召开前后，一些共产党员经受不住敌人的利益诱惑和严刑拷打，走上了腐化堕落、投敌叛变的道路。在如此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如果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必然“一冲即散”。因此，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特别强调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组织问题决议案》第三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政治纪律”这个概念，凸显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纪律的重视程度，将其与党的其他纪律进行了区别，初步体现出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大革命失

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才能确保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要求全党必须重视政治纪律，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四大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994人；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已达57900多人，两年中增加了近60倍。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有效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党的团结，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才能确保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大背景下，铁的纪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重要保证。

（图文由中央档案馆提供）

随感

大家平时说起面子与原则，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似乎不辩自明。但很多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做起来，常常有点拎不清、犯糊涂。对于普通群众而言，有时倒也无可厚非，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原则问题容不得丝毫含糊。

原则就是规矩和准则，既是黑白分明的界线，更是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恪守的底线、不能踩踏的红线。习主席强调：“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原则是用来恪守和遵循的，而不是用来逾越和打破的。原则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在这道并不复杂的“选择题”上，有些党员干部却选错了答案。他们把原则抛之脑后，以照顾面子为借口，奉行“好人主义”，乐于当“好好先生”，赚得“好口碑”，捞取个人私利。

讲原则不讲面子，就要做到无私无我。心底无私，才能行得正、站得直。以“小我”的牺牲奉献，追求“大我”“无我”的精神境界，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这样写道：“我想，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于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其中一条就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反观现在，有的人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把分管工作搞成私人领地；有的人急功近利，热衷于出政绩留印记，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人溜须拍马、曲意逢迎以博上位，对上一味讨好，对下苛责苛刻；有的人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交际广泛，为了亲戚、老乡、战友、老领导请托，到处说情打招呼捞好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表面上看是虚荣心强，要面子、重情谊，过了“人情关”，其实都是私心杂念作祟，以致清风正气不彰、歪风邪气附身。

讲原则不讲面子，就要站稳立场、敢于斗争。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陈毅同志写过一组题为《西山红叶》的诗，其中一首对斗争精神进行了歌颂：“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回溯党史，从“八七”会议到古田会议，再到遵义会议，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与命运的紧要关头，无不是在与错误的思想路线作斗争中确立了正确的思想指导。现实中，有人为面子问题所困，不讲党性原则，把党内生活搞得庸俗化，奉行明哲保身，对错误思想态度暧昧，不敢批评不敢较真，

面子与原则

■钟 桦

明知他人有问题不提醒不斗争不报告，装聋作哑，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邓小平同志曾说：“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所谓的“留面子”“碍于面子”，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犯错误！

讲原则不讲面子，要一以贯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研究分析了明代刘瑾、魏忠贤、严嵩、严嵩等贪官的例子，认为一个原本还算品行端正、敦厚的，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实践证明，党性修养不会随着职务提升、年龄增长而自然提高，如果不能时时处处加强思想改造和政治锻造，无论过去是怎样的“钢筋铁骨”“不坏之身”，也难以始终如一、永不变色。明代官员王延相乘轿偶遇大雨，轿夫穿着新鞋十分顾惜，后来一不小心踏入泥水之中，就随意而行了。这个“新鞋泥污”的故事，启示我们要慎独，原则一旦被突破，便一发不可收，产生“破窗效应”，遭患无穷。大是大非上是如此，小事小节上也是如此。讲原则不讲面子，不能只是做一阵子，而是要坚守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才能始终让党性得过得、靠得住、能放心。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越是关键时刻要处，越要讲原则不讲面子，经受住复杂严峻环境的考验，始终保持清醒坚定，真正做到“花繁柳密处拨得开，风狂雨急时立得住”。



上图：长征组雕之“爬雪山”（雕塑，局部） 吴为山主创
左图：雕塑重点表现的烈士之手。

在爬雪山时，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发现雪地上露出一只手，手里握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这枚银元是他向党交出的最后党费。即使到了生命最后时刻，这位红军战士仍不忘作为党员该尽的义务。这个震撼人心的历史细节，是主创团队在创作《爬雪山》雕塑时重点刻画的内容之一。

（文/郎铮）

口述

由于红7军在果化激战中，受到较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整顿组织，补充人员，提高官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前委决定：部队在平马镇（今属广西百色田东县）进行整训。于是，为期3个月的平马整训开始了。

整训的内容，主要是回顾和总结红7军建立以来部队建设和作战的经验教训。由军首长作报告，学习有关政治文件，开展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素质，使广大红军战士自觉地树立起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而战斗的革命思想。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发扬民主，加强组织纪律性，密切官兵关系，使红军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在整训期间，红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除粮食有保证外，每天每人连2钱肉、2分钱菜的伙食也难以维持。这对部队来说事关重大，亟待解决。当时，我已

